

特别策划

我国长篇小说年均创作量已突破1万部,但其中工业题材的作品不到1%,精品更为稀缺。如何让坚硬的工业题材与柔软的心灵对话,让读者喜欢的工业文学走向更好的深广度及文学品位,2022年,水运宪和周梅森分别做了尝试——

赣版好书

呈现江西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

钟小武

小人物与大国重工

探寻工业小说创作新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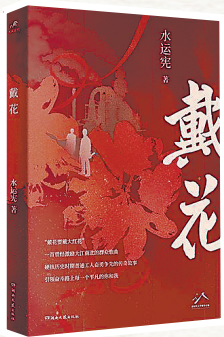
周颖

长篇小说《戴花》是值得探秘的文本,有戏剧剧本风格,富于感染力,也为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贵的探索。

革新与超越是《戴花》的主题。特殊历史时期里,师徒两代炉工劳模从日渐齐心到隔心,再到并肩接理想奋斗的奋斗历程,颇具精神传承意味。

《戴花》找到了某种破除代际陌生成感的写作密钥。读者阅读时,常常遭遇陌生化阻隔,且大多是代际阻隔。同是书写工人,不妨将《戴花》与《人世间》作一番横向比较。《人世间》勾勒了一幅20世纪90年代工人像世情图,在一缕缕四邻倒水问好的晨光里,一声声烂路上辞旧的鞭炮声中,家庭阵痛、邻里纠葛一点点呈现,书写者与读者共同搜集着庸常缝隙里的光与爱。《戴花》则无意于主观介入评述时代浪潮,它通过师娘、老对头段一村、领导兼堂哥工会主席莫德龙、师兄兄弟、杨哲民和徐士良等人物,从外部视角拼凑起“我师傅”莫正强的形象——一个保持了良心、光明和宁静于内的人。经由立人风骨这一出彩的书写,作者水运宪用一支不枝不蔓的笔告诉年轻读者——俱往矣,但精神可以活下来。隔着大半世纪的岁月风云,新中国第一代劳模工人的铮铮铁骨,悄无声息地撞击着今天的年轻人的心。文艺评论家程德培曾对工业题材小说《雾行者》作出评价:“尽管由于代际关系,这场阅读带给我诸多的陌生感。看了作者一些谈话和答记者问,此类陌生感越发强烈。”而不同于《人世间》《雾行者》等工业题材创作,1948年出生的水运宪,较好地探索了代际陌生感这一写作难题。《戴花》似乎成了水运宪不得不写的那本书,作为听着“戴花要戴大红花”长大的孩子,那些奋斗印记是属于他们一代人的宝贵集体记忆。

《戴花》的独特处,还在于呈现了



《戴花》 水运宪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较强的戏剧剧本特质。首先,该书可读性强,情感饱满,主人公形象鲜明,出场调度很有章法,而这或许与作者的经历有关。水运宪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创作中电影剧本占比很大,诸如观众熟悉的《乾隆王朝》《乌龙山剿匪记》等。其次,《戴花》是向内转的写作,关注人物内心,在寥寥数场的高潮“戏份”中,生动刻画了师傅莫正强的“魂”——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钢铁脊梁的形象由此变得鲜活。眼袋下头长着胡须的“莫胡子”,其貌不扬、威信极高,自视高、求上进,手底下有真功夫,心里头有超越世俗的追求,顶天立地也颇有城府,工于算计的同时十分仗义。谢冕曾说,“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莫师傅初见时不设防地把徒弟领回家,是磊落本分;顺手偷钱又还钱的矛盾行为,外化了人物的内心挣扎;通过自我审判,他亲手将追求了毕生的劳模奖章摘下,令人动容;用身体去堵上千度高温铁水的大无畏工匠精神,惊心动魄;临终前,他将衣钵交给下一代的从容,坦然可敬。这一切书写奔流不息,水到渠成。此外,作者熟悉叙事节奏、高潮推进、情节铺垫等戏剧手法,如杨哲民、姜红梅、徐士良、吴启军等青年工人形象的塑造,无论是性格特质的逐一勾勒,还是人物关系的纠缠转变,都源于他们入职时的一组黑白照片。这一情节的简洁铺垫,便颇具戏剧意味。

《戴花》的此类戏剧性追求,也引发了部分读者争议。他们认为,该作品文学性上存在不足。诚然,戏剧遵循一根主线原则,主要笔墨与情感调度集中服务于主要人物、主题思想。在《戴花》中,社会世情展示、工厂内外世界基本呈现、工人日常生活描写、人物辗转腾挪的空间转换等,都缺失了。甚至主人公生活工作的德华电机总厂,也不过寥寥数语交代过去。水运宪最感兴趣的是人,他对几个辗转跌宕的高潮进行集中泼墨,代表性地书写了徐士良的悲剧等支线故事,除此之外,再无闲笔。可以说,《戴花》得之于戏剧,失之于戏剧。

在轰轰烈烈的当代中国工业建设面前,与之匹配的文学精品较为稀缺。《戴花》的戏剧式写作,探索了一条通往工业题材文学精品的创作路径,但也伴随着新的问题。而这,让关注和讨论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变得更有现实意义。



《大博弈》 周梅森著 作家出版社

回到真实的生产车间里

魏宗鹏

电视剧《大博弈》热播,引发热议,我们也来议一议周梅森的这部同名小说。

周梅森擅长借助小故事来展现历史大叙事。《大博弈》书写时代浪潮下的中国工业制造,围绕着一个机械制造厂展开,讲了一个与工业相关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不是制造,而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孙和平等一批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勇于拼搏亮剑的故事。

《大博弈》传递着一种既明晰又复杂的时代感,试图直击部分国有企业发展中的痛点。当我们深入到改革开放这场历史变革当中,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个人、企业、国家之间的联系,而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成就的来之不易与道路之艰辛。就像小说里的一个情节,刘必定在企业濒临破产的时候,面对万般困难,也不接受国外资本的收购。以刘必定这个角色为缩影,其实展现出了中国企业家真切的爱国情怀,中国人办企业,除了要依靠市场的原则认真经营外,内心也有一份振兴中华的豪情。《大博弈》中的孙和平能力强,可以救机械厂于危难之中,但是这种能力又无法在集团里充分发挥,并且理由也特别充分,“服从组织安排”。周梅森在这里直击一些国有企业发展的痛点:企业发展到底要“顾全大局”还是要遵循市场原则?在小说中,以顾全大局为核心的刘必定、孙和平激烈交锋,将这个对峙展现得非常清楚。读者在阅读这个部分的时候,可能会有两种直接的感受:其一,双方说得都对;其二,国企真难干。改革开放这条路从来都不是顺风顺水的,它真的在“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过程中的所有经历构成了改革开放历史的真实画卷。而在这一幅幅的真实画卷中,都聚集着一个个真实的人物。本书将国企改革过程中所遭遇的这种不同理念的交汇碰撞显得淋漓尽致。但读罢,我又感到一些遗憾:小说揭示的这些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当然,这种遗憾和追问已经远远超出一部小说能够承载的分量。但是,我实在不喜作家在小说中对这类问题的所谓辩证式的回应。比如“我既不赞成孙和平把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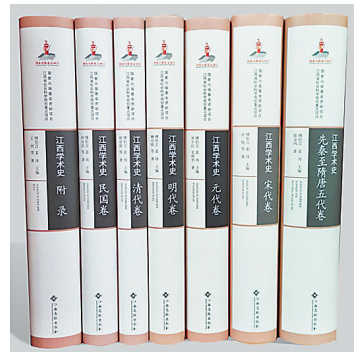


机独立分出去,也不允许杨柳排挤孙和平”。这种“既要顾全大局,也要尊重市场”的回应就像隔靴搔痒。

《大博弈》是一个大时代的隐喻,似乎资本、市场、股份才是小说叙事的主线。所谓大博弈是资本市场的博弈,是权力之间的博弈,所以借助这场博弈,读者能看到里面突出的对峙和问题,但以这样的视角切入也限制了发现出路的眼光。无论是汉重集团还是北机,它们都围绕着工业。很多书评人认为《大博弈》是工业题材的作品。但是,作者显然没有抓住工业,而是抓着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博弈发力。可是,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读者们的提示,如果人们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中理清不清问题的头绪,那么不妨邀请大家去生产领域看一看。何为工业?工业以制造和技术为核心,而制造和技术又是以生产为核心。

若想真的触及时代的难题就还得回到实际的生产领域当中,回到真实的生产车间里。这就是历史唯物论的方法,企业最基础的生产领域反映的是最真实的生产关系。小说里着墨不多地谈论了北机厂的改革成功,除了在主要叙事上强调了孙和平在资本运作上的成功,也谈到了他在生产领域的一些措施,比如在小说的开篇,机械厂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被退货,孙和平在工人和干部面前用铁锤将那些“废铜烂铁”“工业垃圾”砸碎。再有,他用透明玻璃板来间隔生产车间和干部办公区,工人和干部可以实时看到双方的工作状态。

其实在这些生产的细节调整中,就孕育着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但作家无意在此处深耕。或者说,与看似乏味的工业生产和技术研发相比,企业间的博弈,企业家在资本市场的冒险,似乎更能彰显创新精神和改革精神。但是,文艺工作者不光要迎合市场、迎合受众,也要揭示问题、直面问题、反思问题,甚至要提示读者一个正确的思考方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处在一线生产端的具体的生产实践才是北机厂得以翻身的关键,北机厂观念的变革是因为在生产的实践中已然蕴含了先进的生产意识和观念,只不过孙和平将其激发出来。周梅森借助《大博弈》确实给我们展示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鲜明时代特征与时代问题,但遗憾的是,从资本市场、股份、企业的主线叙事中,我们只能看到问题,看了个热闹,中间隔了一层。至于这一层叫生产实践还是叫人民群众,这个问题就留给读者吧。



《江西学术史》 傅伯言 姜玮主编 江西高校出版社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加快文化强省建设,努力重塑赣鄱文化新辉煌。省内学术研究机构 and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大力推动江西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整理、研究、宣传江西的历史文化。2022年12月,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江西学术史》,是江西学者在这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

《江西学术史》,共7大卷,300多万字,由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知名学者历时10多年完成。全书大气磅礴,内容丰富,整理、研究了上自秦汉,下至民国2000多年间江西学术的缘起、发展、传承、演变的历史过程,江西历史上的儒释道各学派从历史中走来,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在字里行间展现,向读者呈现江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为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七卷本的《江西学术史》,填补了江西地方史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学术研究的开创性。近年来,全国地域文化的发掘、整理工作成果丰硕,各省多有地方史、地方文化史之类的著作出版,但鲜有着眼一地“学术史”角度展开研究并形成成果的,《江西学术史》走在了全国前列。这对当前全国性的“地域文化”探讨,无疑是一次新的尝试与探索,在文化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故其意义重大。

文献资料的丰富性。综观七卷本的《江西学术史》,各分册撰述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是高度重视相关史料的发掘、搜集、梳理和运用,不仅关注以前未问世的书面文献,而且注重地下新发掘的考古资料,如海昏侯的出土资料等,各分册对应时段的史料发掘力度都很大,所呈现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翔实。

研究视野的延展性。《江西学术史》的研究视野虽重心在“学术史”,但研究团队并不止步于此,相关研究既有起点上的学术史视野,又具备了思想史的眼光,做到了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统一。这是很难得的,因其需要相当扎实的学术功力,学术与思想的阐述才能合理到位。

论史断人的缜密性。学术史的研究,还需要一种整体的、融通的文化史眼光。细读这套书的每一册,我们不仅可从中透见作者的这种宏大文化视野,亦可见其宏观微观结合的深细功夫,尤其是善于从每个朝代的史学大背景及人物关系去把握具体人物的思想演变轨迹,对重要学术人物的把握,能够结合时代背景、历史文化背景,阐述其学术内涵,且繁简得当。这其实很需要历史年代学及考证学功底,并且对人物思想有持续深入的研究。

资料使用的严谨性。从具体的著述方法论上看,这套书还具备一个明显特点,即特别重视文献选择和注解的严谨性,相关文献的引用,尽量选择一手资料或权威底本,每条注解在核对出处的前提下,又反复对照原文重审、重校。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在当下的学术研究环境中说易行难,但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套学术史的真正价值。

可以预见,《江西学术史》的出版,不仅会形成全国地域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参照,还将极大推动江西本土历史文化的整理与探究。

书经典

考量春秋文学的本义

钟振振

读完新近出版的邵炳军作品《政治生态变革与诗礼文化演进——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世考论(上)》,颇多感触。

此著历时二十二载,体大思精。作者把此著比喻为“难产儿”,笔者更愿将其视为“成熟的新生儿”。本人见证此著由原先4章15万字,扩充到如今9章67万字。此后补写的5章,不仅填补了“二王并立”政治环境下新兴诸侯国与被灭诸侯国的视角空缺,同时不离“二王并立”的时间主线,完善了“平王东迁雒邑”与“携王被晋文侯所弑”两个重要事件,分别展示了“二王并立”格局的形成与终结。

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的出现,是春秋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点,也是研究



《政治生态变革与诗礼文化演进》 邵炳军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春秋诗歌乃至整个春秋文学的起始点。但是这一历史现象却没有引起太多《诗经》研究学者的注意,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尚未见到。而该书视角独特,从“二王并立”这一大政治格局的独特视角出发,聚焦“二王并立”特殊政治环境中的诗人及其诗歌,在考证诗人人生事迹的基础上进行诗歌作品断代研

究,力图探讨春秋政治兴变与诗歌创作演化的关系,进而揭示春秋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

两周之际,“二王并立”,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诗人的诗歌创作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性与目的性,这是政治道德教化的需要与要求。那么要探求诗歌的本义,离不开“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原则,要深入了解诗歌作品与诗人的身世、经历、思想感情的关系,并将作家作品放到大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中进行考量,才能对诗旨与诗本事有更准确的把握。比如对《小雅·节南山》一诗创作年代的考订,系统分析“家父”的族属、世系、期望、生活时代,通过“知人论世”对诗人创作心态与创作动机进行理性分析。

“知人论世”又离不开严谨的训诂考据,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必须充分利用现

有的文献史料,在广泛搜集、排比前人和今人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廓清事实;同时,又要尽可能利用出土文物和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的新材料,钩沉索隐,考订和还原文学史实,力图得出新结论。该书将“知人论世”的史学研究方法与训诂考据的文献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在充分参考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每篇诗作的作家情况、时代背景都进行了严谨详实的考证。该书能够克服史料残缺之难,列陈材料丰富,提出新说合理,既展现出文献搜集的用心,更凸显出材料鉴定的审慎。比如,对于周大夫凡伯和卿士卫武公的生平事迹的考论便是如此。

不论从文献功底还是理论阐发角度看,本书都是《诗经》研究与诗礼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